

昆仑文学丛书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钱钢 江永红

蓝军司令



钱钢
江永红

藍軍司令

•昆仑文学丛书•

蓝军司令

钱钢 江永红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版(北京西什库茅屋胡同甲3号)

二二〇七工厂印刷·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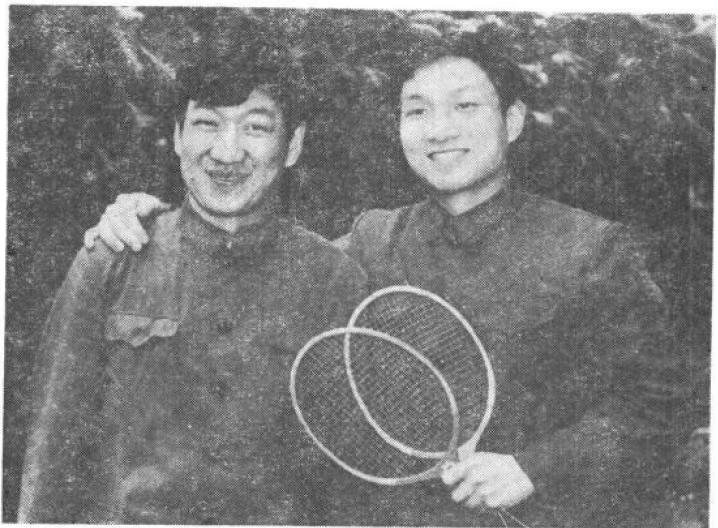
*

开本787×1092毫米1/32·印张7·插页3·字数127,000

1985年2月第1版·1985年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41,000

书号10137·129 定价0.73元



江永红（左）、钱钢近影

我三十四岁才开始在文学的赛场上起跳。

既然迟到了，试跳高度就要比别人选择得更高。

江永红

每个人都能占有阳光。但，只有拿着聚光镜的孩子，才能用它燃起一簇耀眼的火苗。

我常想：我们最缺少的，也许不是力，而是力的凝聚！

钱钢

作 者 小 传

江永红，1947年生于湖北省天门县一个贫苦农民家庭。1966年高中毕业后，当过小学教员和印刷工人。1968年参军，历任炊事员、排长、指导员、干事、教导员。1979年起任解放军报记者。从小爱好文学，发表过《闯入神圣殿堂的“怪客”》、《风格》等报告文学和小说。

钱钢，1953年生于浙江杭州一个军人家庭，1969年参军。1979年初，和江永红一起被派往中越边境，参加自卫还击战的战地报道，随后调解放军报社记者。近年来，除与江永红合作写过一些作品，还发表过报告文学《茉莉簇拥的小屋》、《火药发明者的子孙》（合作），以及一些散文和诗。

“改革美”的可喜的发掘（序）

元 辉

对于报告文学的热心读者来说，江永红、钱钢已经不是陌生的名字。三年前，当他们写出《蓝军司令》的时候，就以其对军事训练改革的敏锐感应而引人注目。从那以后，他们一直在笔踪改革者跋涉的脚步，而且取得了可观的成绩。

在报告文学创作方面，他们的成品并不算多。这个集子所收的五篇，几乎是他们迄今为止的全部作品。而这五篇，主人公都具有鲜明的改革者气质——有胆有识，有棱有角，敢于摒弃陈规俗见，标新立异；力求在过去和未来之间找到进取的途径，把我们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阶段。这也可以说明，作者在创作中所追求的是什么。《军长》，把对于现代战争严酷性的思考，从更高一级指挥员的角度，提到今天的军人面前。和《蓝军司令》一样，训练改革的生活画面，都是从广阔的背景上展开来的，给人一种历史纵深感。对于过去的挑剔检讨，对于未来的深谋远虑，都带着咄咄逼人的严峻气氛。那些仅仅从准星靶环

上，从擒拿格斗中、从手榴弹投掷的弹着点上，去思考战争胜负、军人使命的作品，相形之下，就未免使人感到太陈旧、太小家子气了。《惊蛰之声》，把一个在我军两用人才活动中起过先行作用的指导员夏家田置于作品的中心。尽管这个基层干部，身上并非没有杂质，工作中并非没有失误，但毕竟是一个变革潮头的弄潮儿，作者是带着鲜明的倾向去写他的。在作者笔下，他的欢乐和苦恼，他的得意和失意，远远超出了个人的命运，而带有浓重的时代色调。“惊蛰之声”，也许使人觉得用语过重；那个在假日里由于生活枯燥得无聊而比赛睡大觉的场面，也许太可笑了而使人觉得难以置信；作者对于军营生活的某些看法，也许会引起异议，但要是真正面对八十年代军营的现实：新的形势，新的风尚，带来日益增多的开放型性格，他们不习惯于让今天重复昨天，而是要求昨天适应今天；要求对权利和义务进行合理的调整，以求得战时和平时、服役期间和退役之后心理上的平衡。而入党、提干制度的改革，又使某些传统的政治思想工作方法骤然失去吸引力……了解了这一切，你就不能不承认：这个夏家田所标之新，所立之异，能够不胫而走，决不是偶然的。

在一定的意义上说，《骄子》的取材和命意，也许更富有拓新的意味。它不是人们通常属意的题材。按老尺度来衡量，它有多大价值、多大份量呢？论改革，陈纪泉也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业绩。他原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兵头儿”，就是那么大点“用武之地”。他名不见经传——先

进人物的名册里，根本就没有他的份儿。据江永红同志说，他到那个部队去采访时，谁也没想到要他去写写这个“兵头儿”。这个被目为满身“傲气”、“爱管闲事”的刺头兵，在仍然保持着惯性权威的世俗观念里，只能被列入“另册”。但他不承认这种权威，而凭自己的行动在战士们心目中树立起了自己的权威。作者结识他，完全是不期而遇，而且遇上了就锲而不舍。一个老而又老的问题，在作者笔下，被写得这样尖锐，这样发人深思！改革，不是首先要有人才吗？而作者所写，不是人才开发中一个带普遍性的问题吗？假如量人的尺子，还掌握在白衣秀士之流的手里，假如“被曲解了的骄傲”还象紧箍咒一样箍在敢作敢为者头上，假如大批年轻人的生气勃勃，由于“人生老师”的教化而变成鹅卵石似的老子世故，那实在是我们这个时代的不幸。

《奔涌的潮头》触及到一个更关键的问题：干部制度的改革。《骄子》的命意和涉及的范围，在这篇作品里大大地扩展了——从基层，扩展到大军区机关；从对一个“兵头儿”的抑扬褒贬，扩展到多层次干部的升降浮沉。改革的潮头涌进干部部门，传统的任免制度，传统的人事观念，一齐失去常态，按照时代的指令重新调整。这是人们期待已久的事情，难怪同一部队的同一题材，引起了好几位作者的浓厚兴趣，产生了好几篇报告文学。我无意将它们一一比较。但读者会注意到：作者在重复这个题材时，把主题推进了一层：自己立了个制度，自己就得受其

制约。作为干部制度改革的积极倡导者和推行者，团政委怀耀生不得不赞同自己不大顺心的提干人选；师政委范恒盛不得不撤消自己顺心的提干人选。因为民意测验表明了人心的向背。新制度形成的新的人事观念、新的道德规范、新的习惯势力，逼着领导干部非当“包公”不可。改革者必须使自身的更新与整个改革同步，改革才有可能成功。而且，一个新的干部制度既然是正确的，就应当对所有单位一切干部都有制约作用。这一笔点到了要害。但是，在多年形成、盘根错节的人事关系中，这个“当然性”，还有待进行艰苦的求证。它是另一个领域的“哥德巴赫猜想”。对它的结果我们应当有信心；廉价的乐观也是不切实际的。笔触伸进到这里，显见作者思想过人的锋利。

也许，因为两位作者是做记者工作的，他们这个长处肯定得益于其职业的磨炼。但这毕竟只是一个外部条件。如果主观上不具备一定的素质，也是难有所成的。我和作者同在一个新闻单位，虽然因为他们常驻外地，平时不常接触，但多少有些了解。他们思想活跃，对新的生活信息富有敏感。从交谈中，从他们所写的消息中、报道中，以及关于报纸改革的建议中，都可以看出这种素质。我佩服他们，甚至有点嫉妒。因为我也写过一点报告文学，今后如果有条件，还想继续尝试写。但无论是政治敏感，还是新的生活信息的积累（而后者又是前者必要的前提），我都自愧不如，这就很可能只是一种难遂的愿望。我听钱钢

和江永红同志谈过，他们是怎样写起报告文学来的。他们原来只是把他们在生活激流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思，用新闻形式反映出来。这也是记者的本职工作。后来，新的生活信息积累得多了，对一些问题思考得深了，消息、报道已不足以容纳，这才想到写报告文学。写《蓝军司令》，实际上是找到了一个机遇，一个口子，把长期以来胸中的积虑一吐为快。“蓝军司令”和军长的思路，和他们从生活中长期观察形成的思路非常合拍，他们这才“借酒浇愁”，“借花献佛”。《骄子》的写作也是如此。据钱钢说，江永红本人就是个颇有几分陈纪泉式的“傲气”的人物，而且也不时受到“舆论”的压力；他自己又在连队当过几年指导员，颇了解些陈纪泉们在那种环境里的酸甜苦辣，所以才在生活中“同气相求”，在稿纸上“同声相应”。那个夏家田，则是他们的知心好友，碰到一起时，可以无话不谈。这也证明了文学创作中的一个常理：作者对于题材和写作对象的选择，总是带有自己的个性、自己的思想和感情的烙印。否则，你所写的人物，不管在生活中多么先进，要想从笔下生发出饱满的激情和血肉感，恐怕也很难。

上面所说的选择性，不用说，和作者的审美标准是相联系的。不知道钱钢、江永红同志是否出于完全的自觉，从其作品的特色看来，他们写改革生活，不是着眼于写事件，而是着眼于写人物；而从他们所寄意的人物来看，他们倾心的是一种改革型的性格美。夏家田、陈纪泉、《奔涌的潮头》中的邵才华，这样一些人物，按传统的审美

观，你大概很难看得上，甚至会觉得有点儿“出格”。可是，我们的美好前景不就得寄托在这等人物身上吗？美的评价标准，能不顾历史发展的要求吗？为了强调改革美而否定传统美，那是唐突的、愚蠢的，但是新的时代已经把传统美的发展和更新，迫不及待地提到日程上来了。美好生活的开拓者，有权利得到新的审美观的强大支持。在生活中应该是这样，文学创作当然也应该这样。仅仅就此而言，钱钢和江永红同志所作的努力，也是值得赞赏的。

写改革美，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用报告文学来写，更难。这个难度，和改革者在实践中碰到的难度，往往成正比。生活当中改革的阻力，在写作和作品送审过程中，也往往是难对付的阻力。改革者所需要的胆识，改革者的文学代言人同样也需要。和传统美相比，改革美的发掘和获得公认，可能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因为前者毕竟已经日习月染，传之久远了。后者则还在呱呱坠地，它会长成个什么样儿，美少年还是丑八怪？还是个未知数哩！得有逼视生活的勇气，也得有鉴别生活的眼力。这勇气，看来两位作者是不缺少的；这眼力，相信他们会随着对生活的关注和严肃探索而与年俱增。江、钱两位都才过而立之年，难能可贵的是，他们对于笔下涉及的人物和事件，都比较注意从历史的角度加以评判，或褒或贬，尽量照应到人物所处的历史环境。这就给他们的作品带来一种凝重感、深沉感。改革是一个历史的经程，搞改革也好，写改革也好，都不能不考虑到各种复杂的历史因素。正象《惊蛰》之

声》篇末所说：“人们可以剖析历史，评判历史，但却无权嘲讽历史。”但要真正做到论事尖锐而又不失之于偏颇，文笔犀利而又无懈可击，在历史的听证会上经得起质询，那是很不容易的。就这个集子来看，也还不能说，每一篇都达到了这个境界。在这个决非无关紧要的问题上，我想：钱、江两位同志是不会自满的。至于他们在艺术表现上所作的努力和取得的成就，我想毋须赘言。读者读完这个集子，自会作出公正的评价。其中如《蓝军司令》、《军长》、《骄子》等篇艺术上的特色：叙事、抒情和哲理性议论的浑然一体；结构上的开合自如；剪裁上的详略有度；情节穿插和行文上的跌宕有致，已有一些同志著文指出。这些特色似乎表明，作者为了驾驭这种文体，有意识地追求着这样一种叙述语调：把客观物象和主观感受最大限度地揉合起来，以达到虚实相生、情理相契的艺术效果。在遣材上也往往采用横向式结构，而不拘泥于事件发展的时序。这些追求，已经使他们的报告文学作品逐渐形成自己的风格。如果苛求的话，有的作品在宣泄自己的思绪时，是否稍稍失去了控制，以致使人感到“喧主夺宾”？我想，大概是作者平常对一些问题想得很多，得有机遇，就禁不住想纵情倾吐。我是从我自己常犯此病联想到这点的。如果我的猜测不错，愿以此语共勉共戒。

一九八四年五月二十日

• 昆仑文学丛书 •

我们编辑出版这套《昆仑文学丛书》，愿她成为一个小小的窗口，使革命战争的血与火、真理与正义，以及献身军事战线的千万战士的音容笑貌与心灵世界，他们的爱或憎、辉煌的或平凡的生活、壮烈的或默默的牺牲，能够在这里多少有所展示；愿她成为一片小小的园林，使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嫩苗在这里成长，绿树在这里成荫。

这套文学丛书选辑的是军事题材中短篇小说、报告文学、散文，以及其他文学作品。作者是军内军外中青年作家。从八三年开始，计划每年出一套，每套约十二本，每本十万字左右。每套书的最后一本是军事文学创作论集，其它都是作家的个人作品专集。以有限的规模而获得众多读者的喜爱，是我们的向往。为了实现这个奢望，我们当力求做到编选谨严，出版及时，印制精良。

目 次

“改革美”的可喜的发掘（序） 元 辉（ 1 ）

蓝军司令 江永红 钱 钢（ 1 ）

军 长 钱 钢 江永红（ 22 ）

惊蛰之声 钱 钢（ 46 ）

骄 子 江永红（ 104 ）

奔涌的潮头 钱 钢 江永红（ 127 ）

目标：正前方（代后记）

——致读者朋友 （ 197 ）

蓝军司令

江永红 钱钢

“不能容忍的笑声”

“王聚生，赶快退呀！”演习导演赵科长下达了命令。按演习常规，“红”、“蓝”双方都是由导演调理的。

“去！蓝军还没死完哩！”“蓝军司令”王聚生一点也不让人。

“你挂几号，不服从命令？”

“上了战场，强者为大！”

.....

一五四高地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火药堆。成吨的“梯恩梯”还没有炸完，又爆发了导演和“蓝军司令”之间的战争。他们吵得几乎要动手了。不，确切地说已经动手了，手指只差一点点就要戳着对方的鼻尖。

“给我重来！”王聚生张开的双臂痉挛地抖动，象一头雄狮似的吼叫：“给我重来！”

可是他的声音被一阵强劲的山风卷跑了。“红军”士兵摇晃着红旗，欢呼着冲上山来。

“站住！不许动！”

“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脸皮嫩嫩的，唇上还没长出胡子的年轻战士，学着电影上“我军”的样子，在山头上一个个成了顶天立地的英雄，尽情显示着胜利者的威风。他们踩倒了王聚生不愿倒下的蓝旗，用刺刀捅穿了堑壕边的靶子，扯开衣领，抛着帽子，拥抱、蹦跳，“噏——噏”地叫唤。山下还不时有掉队的跟上来：呼哧呼哧拉着“风箱”，咕咚咕咚灌着凉水。这些大孩子，象少先队员在队日活动里参加登山比赛一样，精疲力竭而又玩性十足，在大自然的怀抱中陶醉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笑声！笑声！四面八方的笑声，象炸雷撞击着耳鼓，王聚生感到了一种不能容忍的侮辱。“胜利？胜利个鬼！”

“红军”是怎么上来的？是踩着“蓝军”的地雷上来的，是从“蓝军”的炮口枪口下上来的。毫无敌情观念的战术动作，如同放羊一般的战术指挥，笨拙，低劣，简直是送死，然而却没有一个死去，都是刀枪不入的好汉。他们打败了“蓝军”，攻占了高地，在痛快地笑，笑！

王聚生一脚踢向一根炸断了的木桩。木桩摇摇晃晃滚下山去。他脱掉棉衣甩在地上，趔趄趄趄地，与其说是躺

在棉衣上，不如说是晕倒了。

王聚生有气。王聚生不满。要搞进攻演习了，他提出按敌军的野战防御特点构筑工事、设置障碍。某导演开始说没有必要。负责情况显示的“蓝军司令”王聚生费尽唇舌，讲古今中外的例子，甚至下了“最后通牒”：不体现敌军特点的演习我宁可不搞，这样不但起不到锻炼部队的作用，反而会把部队带坏。导演被逼得没法，总算让了一点步：“你们插几把蓝旗就行了，要不再搭几个茅草棚。”林彪早已死了，居然有人说这种话。王聚生知道叫唤也没有用，干脆自力更生。他“买通”了演习场附近的大队和中学：“你们来人给我们挖工事，完了我教你们打枪，每人三发子弹。”“蓝军”的堑壕、防坦克壕、掩体、铁丝网……就是这样“等价交换”来的。

王聚生有气。王聚生不满。讨论演习方案，分析敌我态势，有人开口“正义必胜”，闭口“敌人是纸老虎”，把战略思想和战术问题一锅煮，越煮越糊涂。敌人是什么样子？两眼一抹黑。我们应如何行动？一套老战法。王聚生听不下去了，劈头摔出一句：“正义必胜，苏军侵捷为什么得逞了？”一位领导同志严肃地打断了他：“王聚生，你胡说八道些啥？你知道正义必胜是谁讲的吗？”有什么办法？盾不能当矛使，矛却是最好的盾。没有比指责别人片面来掩盖自己片面更有利的了。“王聚生，你那个片面性的老毛病要注意嘞！”王聚生认了：“我是片面，敌人的坦克是纸糊的，一戳就破，飞机飞到正义的地方就